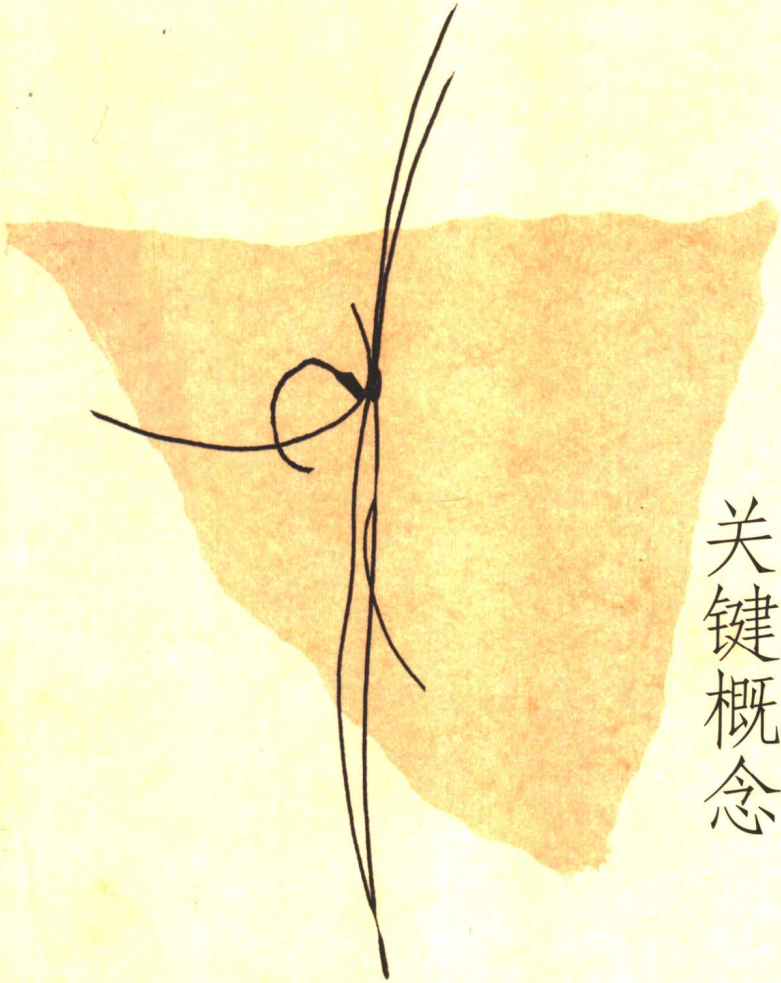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 关键概念

[英] 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

(Nigel Rapport and Joanna Overing) / 著

鲍雯妍 张亚辉 / 译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华夏出版社

社会文化人类学 的关键概念

[英] 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 著
鲍雯妍 张亚辉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英)拉波特,(英)奥弗林著;鲍雯妍,张亚辉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9

ISBN 7-5080-3812-6

I.社… II.①拉… ②奥… ③鲍… ④张… III.①社会人类学②文化人类学
IV.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806 号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by Nigel Rapport and Joanna Overing

© 2000 Nigel Rapport and Joanna Overin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4576

责任编辑:田娟华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25.25

字 数:438 千字

定 价:4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本书包含 60 篇左右的论文，每一篇都讲述一个重要概念，这些概念是从事当代人类学研究需要掌握的基本工具。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简明的知识库，简要地阐释职业人类学家可能使用到的众多主要概念。

这个“阐释”包括展示人类学家如何以多样化的方式去理解本学科的关键概念，这些方式所经历的变迁以及未来可预期的变化。本书既是回顾总结性的，也是问题式的，力图成为一本研究性的指南，为原创性写作提供一个研究工具。

传统上发端于北美的文化人类学和发轫于欧洲的社会人类学在本书中被很好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全世界大学中人类学教学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考虑到目前（后现代、反思）纷繁复杂的范畴划分和存在的对现有权威理论的挑战，本书将人类学置于一个变化的学科环境——变化中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方法论和认识论。本书汲取了大量的学科资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以及语言学），从而使人类学置身于一个宽广的人文视野之中。

一本讨论人类学关键概念的书是一种开创。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类学入门读物（例如：《社会人类学》（Leach 1982），《他者文化》（Beattie 1964）），也有很多词典（《人类学词典》（Barfield 1997），《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Seymour-Smith 1986））和百科全书（《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Barnard and Spencer 1996））以及指南手册（Ingold 1994a），但尚未出现试图通过关键概念从理论性、方法论、分析性和民族志式描述等方面提炼出“人类学智慧”的作品。

两本最能提供借鉴的读物是，Robert Winthrop 的《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词典》（1991）和由 Emile Boonzaier 与 John Sharp 编撰的《南非的关键词》（1988），Winthrop 更强调“文化人类学”作为对“由文化规约的思想和行为”（1991：ix）的描述与阐释，也就是说，在

他重点突出的 80 个概念中与本书所选的概念存在少数重叠之处，例如“社区”、“阐释”、“网络”、“城市化”、“世界观”。Boonzaier 与 Sharp 分析了 13 个关键概念，这些概念被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用来建构、表述、客观化和阐释南非的种族隔离。虽然本书同 Boonzaier 与 Sharp 的书相比更少带有民族志的色彩，却也力图审视旨在研究“文化和社会”的人类学学科，并将其与更广的哲学与民俗论述联系起来。

在讨论亲属制度时本书也回应了 Boonzaier 和 Sharp，吸收了 Raymond Williams 最初源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的一些见解。1976 年 Williams 出版了一本名为《关键词》的书，致力于对与西方社会和文化有关的论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清晰划分。二战以后这一方法曾在德国风靡一时，在 Begriffsgeschichte（德语）或者称为“概念史”的名义下，揭示概念在形成过程中的变迁和不连续性。该方法认为这是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晴雨表，同时也正是这些变化所赖以形成的工具。通过聚合“关键词”，Williams（1983a: 15）展现了他探索如何详尽的描述西方想象中的这一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他认为有 131 个词因其广泛的社会文化重要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些词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持久的价值，代表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并且与特定的基本活动相关。

本书所标明的这些关键概念可被视为从宽广的相互关联的人类学工作中抽取出来的一些散落在各处的关键节点，对其应当有更加清晰的理解。本书将“概念”视为“由思想的力量形成的事物”，亦是“常识、设想、思考和计划”（Chambers 1966）。从更为技术性的角度看，或许有人会希望通过“概念”定义出人类思考的这些特定事物、它们在特定时刻的含义、这些概念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分类体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关联（参见 McInnis 1991: vii）。书中的每条概念都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人类学的思想，因此，对概念在运用中所涉及的领域以及与其他概念条目之间的关联进行描述，也向读者提供必要的指示。

Raymond Williams 看待西方社会文化论述的方式无疑是一次有限的尝试，既具有一定的偏见性、主观性，也是标识性的和开放性的思考。同时正如它声称的那样，它本身也开创了一个领域，力图超越它所列出的这些词汇，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指南。关

关键词的提法意在提供一个争论的空间，而不仅仅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这本书正是为此而生的。本书渗透了各个作者的观点，是他们所看到和阐释的人类学领域。事实上，这些作者将会认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如同其他制度安排一样）的运用本身就在表达某种观点，具有偶然性、主体性，亦是某一情境下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又是反规律的，即它天然就是“人类学性质”的观念。

本书以 60 篇左右的论文形式来讨论这些关键概念，根据概念的重要程度和相应的讨论的复杂程度的不同，每一篇论文的长度大约在 500 字到 5000 字之间。概念也包括各种类型：实体性的（如“能动和能动性”、“意识”、“性别”），认识论的（如“控制”、“亲属制度”、“世界观”），方法论的（如“文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文学性”），理论性的（如“社区”、“无家可归者”、“城市化”）以及民族志式的（“家和无家”、“神话”、“旅行”）。

这些论文的形式旨在为该概念在运用上的历程和相关讨论提供充足的空间，也关注概念的含义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以及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除了业已标出的概念条目，还有一个详细的本书索引，可用来快速查询本学科各个领域中的更多的精确要点。最后还有一个细致的资料文献参考书目，可指导读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阅读。

鉴于本书所涉及主题的多样性、侧重点和开明的思路，希望能在学术风气的连贯性和整体的声音一致性两方面达到双重的权威效果，至少可在叙事的张力上获得一致与连贯。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过众多有力的协助，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建议，作者在此要特别感谢 Anthony Cohen, Andrew Dawson, Alan Passes, Marnio Teixeira - Pinto, Jonathan Skinner; Elizabeth Munro, Napier Russell; 以及 Routledge 的编辑 Roger Thorp 和 Hywel Evans, 编审 Michael Fitch。

拉波特和奥弗林
圣安德鲁斯大学
1999 年

目 录

前 言	(1)
1 能动和能动性	(1)
2 相异性	(8)
3 自我的人类学	(15)
4 儿 童	(24)
5 分 类	(27)
6 代 码	(33)
7 认 知	(42)
8 常 识	(48)
9 社 区	(50)
10 意 识	(55)
11 矛 盾	(66)
12 交 谈	(74)
13 文 化	(77)
14 控 制	(85)
15 对话与类推	(96)
16 话 语	(98)
17 阴性书写	(105)
18 俗民方法论	(108)
19 形式与内容	(114)
20 性 别	(119)
21 流言蜚语	(129)
22 家和无家	(131)
23 人 权	(137)
24 人文主义	(146)
25 个体主义	(151)
26 个体性	(157)
27 互 动	(166)

28	阐释	(176)
29	反讽	(181)
30	亲属关系	(186)
31	阈限	(196)
32	文学性	(202)
33	方法论的折衷主义	(211)
34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	(215)
35	存在的瞬间	(222)
36	迁移	(226)
37	神话	(233)
38	叙事	(244)
39	网络	(251)
40	去场所化	(253)
41	后现代主义	(255)
42	定性与定量方法论	(263)
43	阅读	(269)
44	乡村牧歌	(273)
45	科学	(279)
46	情境和背景	(288)
47	社会	(290)
48	刻板印象	(298)
49	深描	(304)
50	旅游业	(307)
51	交易	(314)
52	无家可归者	(317)
53	城市化	(326)
54	暴力	(332)
55	视觉主义	(337)
56	制造世界	(341)
57	世界观	(345)
58	书写	(353)
	参考文献	(358)

1 能动和能动性

能动和能动性这两个概念或许更多的是与权力概念密切相关，通常散布在关于个体和社会结构的讨论中，也同以下概念有关：个体意识、个体建构能力、个体建构自身的能力以及最终从外部决定性因素中获取的自由度。

能动性 with 结构

能动在行动，而能动性即是这种能力、权力，正是其成为行动的来源和始作俑者，能动者是行动的主体。韦伯（Weber）认为应区分行动与纯粹（动物）行为，行动是建立在一系列具有人类理性特点的行为基础上的。他感到社会科学是一门对人类行动的意义和行动背后的选择进行解释性研究的学科。米德（G. H. Mead）力图澄清韦伯关于意义的概念以及对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解（*Verstehung*），他将行动划分为：欲望、情境界定和完成。

从涂尔干式的（Durkheimian）观点来看，正确解释人类行动的关键在于所处的情境，在此情境下，意义才得以产生；也取决于那些在各种行动中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规范。因此，超越行动或反行动意味着具有一定约束力甚至是强制性的结构，存在并超越于特定个体的行动之上，并导致个体演绎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因此社会科学要研究的是，这样的正式结构如何产生并怎样精确规约个体行为。“能动性”存在的范围，简而言之，是从一定的集体表象中抽取出来的特质并属于之：在是非观念集结的社会事实中；仅存在于他们未被社会化之前，动物特点（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某种病态）即是个体能够发起的未被先验决定的行动。

韦伯与涂尔干之后关于能动性的大多数学术研究致力于解决这些差异，并揭示个体独立于结构性约束之外的行动的有限性。可是尽管力图进行折衷与和解，这一分类被证明是不易跨越的。要么是在较为个体和

通俗的意义上可以假定结构是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且不可强迫性地决定其创造者的行动。要不然在更为集体性和公共意义上，则可认为结构其实是自成一格的，且决定个体的意识与性格特征：个体的“行动”基本上是制度性的事实和一系列结构关系的表现。

在众多声称进行折衷的研究中，毫无疑问，最著名的是帕森斯（Parsons）1977年提出的社会行动和模式变化理论，博格和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1966年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吉登斯（Giddens）1984年提出的建构理论，布迪厄（Bourdieu）1977年提出的实践与惯习理论。可是上述每一个理论家只可被视为通过优先考虑某种概念来终结这些差异，但是很难说已完成了综合。因此，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行动之间的区别若是只采纳通俗的世界观或是公共性的世界观两者之一时就会不复存在，（当然，对于上述这些学者来讲）更多的时候采纳的是后者（Rapport 1990）。

例如，对布迪厄而言，逃脱公认的社会文化决定机制并非否认先决条件和行动意义的客观性，来以此去除行动的意义和源自个体有意识的动机和考虑。需要一个更为精致且更加有连续性的关于意识的方法来取代简单的对意识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区分的二分法。这一方法也须认识到大多数人类经验位于这两个端点之间，可以称之为“习惯的领域”：大多数意识是“习惯性的”。在此，社会化和早期的习得拥有其最深厚的根基。此时，文化在个体身上进行编码，而个体则成为传递和表达文化编码（如服饰与性别、规则与标准、控制与主导）的记忆承载媒介。在这一介于两端之间的习惯的领域中亦可发现社会交往中的资质：个体不假思索的正确行动。简而言之，人类行为中的习惯，其广泛来源正是外部的限定条件和制度性因素决定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的汇聚。客观社会结构产生“惯习”：一项具有持久性、延续性的安置体系，其功能就是提供结构化的客观一致性的社会实践得以产生的基础。如此的安置和实践可统称为“文化”——一个习惯性行为的习得体系，产生并决定个体的行动计划。总之，社会结构产生文化，而文化则引发实践，实践最终再生产社会结构。

通过这样的方式，布迪厄提供了某种“折衷”来结束业已存在的基于具体化了的抽象概念和物质决定因素之上的结构性因果模式。布迪厄在声称跨越了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二分法的同时依然坚持普适的客观主义。在声称反对回避个体行动的决定性逻辑的同时，正是后者（规则化的即兴表演的无意识约定）近乎于成为社会结构复制的媒介与表达；布迪厄对习惯的主体性由社会过程决定的陈述过于武断。能动性被贬低为

习惯性的对社会结构中的先决条件做出表面上被动消极的反应（Jenkins 1992）。

创造与想象

社会科学在面临尚未能分出高下的争辩时往往在争论中引入变化。这样一来，新的因素就被引入到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中，此时这个新的因素就是“创造”：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结构相关的个体能动性。

贝特森（Bateson）根据新几内亚的 Iatmul 人中的裂变和融合过程认为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应被视为一个“能量源”（1972：126）。它有自身（新陈代谢、认知及其他）的供给力量，而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这能够且与自身行为吻合。而且这一能量一旦作用于世界，推动一定的事件，将会促成一定的关系和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的互动，这又被认为是“有序”或“无序”。

总之，人类个体是能动的世界参与者。实际上，由于他们的能量决定了世界上一定的关系和事物的特征，个体可以说是世界的创造者。被理解为“有序”或“无序”的是指那些被个体当作是正常规范的或是非正常病态的一定事物之间的特定关系；这只是从事物和关系的无数种可能的排列组合中的一部分，对其分类和评价有赖于观察者的眼睛。但没有什么一定是客观和绝对的；“无序”和“有序”是由个体做出的解释和陈述，由个体的思想状态决定，个体是一个具有一定意图的认知实体。在后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多样性，即使在同一时间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地点之间。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是随机混乱的事物对另一个观察者来说则可以是有序的并富含意蕴的，这就导致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安排中相互争辩、冲突和变动不居的特点。

贝特森的观点得到广泛关注，例如精神病学家兰恩（R. D. Laing）将人定义为“一个行动的有机体”，“一个客观宇宙的源泉”（1968：20）。利奇（Edmund Leach）也对贝特森的观点做出回应，认为个体人类思想及其诗性的想象力运作具有无拘无束、不可预测和没有规则可以循依的特点（1976a：5）。利奇得出结论：“你是你自己的创造”（1976b）。

将贝特森民族志的结论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重合的部分加以引申和强调是有益的。正如萨特（Sartre）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造就他自己，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他自己和他的世界。当然，个体生

来就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他们才是他们感知（持续）的创造者，包括他们认同的意义、评价的方式和相应的行动。事实上，个体总是在不断地再造他们的意义、感知、评价以及行动；他们否定自己创造物的本质并加以重塑。他们看上去似乎被环绕在客观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当下中的“真实现实”里，可是他们不过是延续了后者的粗暴，通过意义想象的持续的可能性来超越纯粹的事物核心。在（结构）已给定的可能性和那些成为个体生活一部分的可能性之间存在长期（单一）的相互影响；个体经验不可简约为客观决定性（Kearney 1988：225-41）。

在这一论述中的关键是想象——意识的核心源泉和人类的关键特征。想象是人们经常运用的一种活动；正是通过想象，个体生产并再生产他们存在的本质，使他们成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自己。萨特谈到，想象具有一种“超越和归零的力量”，使得个体能够逃脱被“淹没在现实中”，将他们从既定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成为别的什么，而不是他们看上去可能被造就的样子（1972：273）。人类生活因为想象而具有一种浮现的特征，即不断超越既定的情形、一系列的环境和现状，超越创造它的条件。因为想象，人类世界具有了一种本质的动态秩序，即拥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处于不断的形成和谋划的过程中。由于能够想象，人类无比自由；想象赋予个体以一致性之外的自由空间，“为生命带来滋味和无止境的前进的可能性”（Riesman 1954：38）。

想象以理想化的“不可理喻的”行动这种形式进入现实，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它看上去对既存现实而言是不请自到的、不合道理、“没有原因、基础和证据”（《钱伯斯词典》）。这是一种行动，超越而不是保存其产生的既定情境，超越直观的约定俗成的现实，抵抗生活所面临的来自传统的约束。不可理喻的行动似乎发端于无形且不属于任何事物，从现有的正统和原则性的意义制造过程来看，或多或少是无意义的；不可理喻就是超越了恩德与罪过，超越了善与恶。

最后，正是人类想象这一创造性的行动的不可理喻性使其天然具有冲突性，在想象和现存的惯例之间将存在持续的张力。人类经验和客观生活形式之间非决定性的关系——一方是既定社会文化的概念化的辩证性不可归约的特点，一方是有意识的个体进行的想象——意味着新的意义的生成将总会超越既存的社会文化条件。现有的是过去想象性行动造就的事物，并且有赖于人类持续不断的实践来延续自身的制度，而当前的想象性行动不可避免地将会进入新的可能的未来；造就新世界的过程中，现存世界将被无情地调整、重塑和革新。反过来说，制度的延续性

则是一项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和有意识的决定（而非盲目的一致），要么是双方自愿达成统一，要么是强加的。

人类学与创造

人类的本质，按照利奇的说法，是怨恨他人的控制和现存结构的控制（1977：19-22）。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具有“原罪”，倾向于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反抗现有体系，定要违抗和重新解释习俗。正是这些打破规则的“灵性个体”导致了新的社会形式，也是文化活力存在的根基。然而，创造所具有的针对体系的敌对性意味着它很可能被鉴别成或标志为罪恶和疯癫，甚至即使在它们最终击败了那些体系保守的成见重新定义了何谓英雄、先知和神圣时，亦是如此。

要是将已有关于想象的讨论限定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内，那么利奇是个很好的开始。另一个则是特纳（Victor Turner 1974, 1982a）。通过对 Ndembu 部落过渡仪式的阈限阶段所采取的仪式实践进行抽象，特纳把人类世界的整个象征生产过程看作是在社会结构的正统的不变性和阈限的“社区成员”灵活的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转换。特纳引用萨特关于“自由和过渡”之间的辩证法（正如利奇引用加缪的“本质变革”）建立自己的理论，认为社会应当被视为一个过程，其中结构和创造这两个“敌对的规则”和“原生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下以不同的趋势和程度相互影响和替代。对于那些在现存结构中处于权威、控制、垄断地位的人而言，创造似乎是危险的——无法无天、紊乱和玷污性的，因此，必须事先规约和阻止各种企图以界定出那些正确和可能的行为的表达方式。可是尽管如此，他者的理想化（以及他者的自发表现）将会从结构和先驱者之间的缝隙之中迸发出来，这些先驱者采取敌对性的独创的行为，要么（若不是常态则是仪式性的）在社会之外生存，要么在其再造的想象的社会中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柯奈姆·布里奇在他的《某人，非人：关于个体性的论文》（Kenelm Burridge 1979）中，基于社会结构和个体创造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理论模型。如果“人”被理解成物质（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生存在给定的可能范围之内——由其供给和滋养，亦由其生杀予夺——那么个体的存在是无视这些概念和条件的，总是在寻求那些无序和新的东西，拒绝服从事物本来的面目或者传统的理智和当局者所期望的那样。以往，要“成为”一个个体就是要放弃自我实现而去完成早已定制好的社会关系，统一个体的直觉、感知和

行为而不是在“是什么和可以是什么之间”（Kenelm Burridge 1979: 76）建立辩证的关系。

此外，布里奇认为“个体性”也可是人如何确认达到作为个体的状态的实践，这是每一个“有机体”都能做到的。个体要做的就是将人这一社会性的某人有效地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非人，至少变成一个“行为古怪的”人。无论如何，如果他者愿意接纳他们自己（作为新的理智和新的道德标准）成为概念意义上制造出来的“行为古怪”个体，那么从某人到非人的变化在他们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意义上的某人时达到顶点。也就是说，人是“英雄般”个体的终结点，个体在劝服他者的同时也认识到新的社会条件、规则、状态、角色；这时个体融化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布里奇推断道，从“某人”到“非人”再到“某人”的循环是必然的，个体性是“文化的一项基本事实”（1979: 116）。无论对谁而言，包括采集狩猎者、畜牧者、自给自足的农民、村民、集镇居民还是市民，道德变更、裂变、更新和变革的普遍性机制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不同的物质条件将引发各种情形允许、鼓励或者抑制向个体性的变化以及富有创造性的领悟，但首要的是，个体的创造性意味着不断创造为他们自己提供机会的条件和环境。

综上所述，总有个体命定是“独自的”去与他者互动，以非预先设定的方式与既存的理智互动，逃脱既定文化规则和批评的压力，从而成为尚未结构化的未知领域的先驱。不论是（澳大利亚土著中的）高等级人、（Cuna 的）萨满、（努尔人中）豹皮首领、（印度的）sanyasi，还是（美国的）嬉皮士，新的智识总是由这些新的个体的能动性提供。

人类学与能动性

由个体的创造性导致的新的社会结构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增长，逐渐脱离个体创造者而获得独立，并且凝聚成固定的、客观上一般化的制度性文化形态。可是，与此同时，驱动个体的那种创新的力量依然前行。个体能动性的命运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现自身受到来自结构的威胁（或者愚弄），这一结构已不再适应其创新的要求，即便这个结构曾是自己在某一时期创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形态与其创造过程之间的张力就促成了动态的文化史。

布里奇认为，这一适用于世界的动态过程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描述。个体的创造性提供了生成一种人类学式世界观所必需的领悟力，可是接下来的常规人类学分析倾向于固化、对象化、一般化甚至制度化

其社会文化对象。个体被视为某类人，事件被纳入分类体系，生活的连续性变迁则被挤进有限的笨拙的而又具有逻辑性的有序结构中。

个体的创造性似乎是贯穿于人类学阐释的一条潜在的线索，常常被社会结构的严密和要求给压制。后者无论在其法国式的“深层”表达上（列维-斯特劳斯、格德利埃、杜蒙）还是在“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表达中（拉德克利夫-布朗、福忒斯、盖尔勒），或多或少都有那么点自成一格的决定社会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机制，某种程度上将那些要素（其存在和行为）简单化处理（Park 1974）。个体的能动性在集体性的重压下被埋葬。不过后来的当代民族志及一些具有启示性的思考（从贝特森到利奇和巴斯、特纳以及布里奇等等）都意识到（按照存在主义方式）个体所具有的自身驱动和解放的力量确实能构成一个对人类本质的修正。

例如，将创造性定义为“改造现存文化实践的人类活动”，这些行动由“创造性的角色”承担，产生于传统的形态，并进行超越和再造（Rosaldo 等人 1993：5-6）。关于创造性和人类学的研究（得益于维克多·特纳）将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创造性的“喷发”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功（Shostak）、扣奇提（Babcock）和阿斯图里亚斯（Fernandez）。此时社会结构被理解为“散漫的俗语”（Jackson 1989：20）；一种为个体解释（形式）提供基础的共享的语言体系，能够清晰地表达、传递和代表个体的经验，但却不能概括、提炼和决定个体经验（Parkin 1987：66）。社会结构并非自成一格，也不是靠惯性存在，而是有赖于各个个体持续的有意识的协调行动来进行延伸、生长和维系（Holy and Stuchlik 1981：15-16）。而且社会结构并非总是导致一致性、稳定性、连续性或者协调。作为散漫的俗语和一种编造，它总是创造性解释的主题，个体操纵和再演绎的对象，改变文化的行动的靶心（Handler and Segal 1990：87）。

人类学已经开始以这种方式更加致力于弥合民族志描述中习俗与创造、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间隙。

参见：意识、个体性、交易、制造世界

2 相异性

相异性这一概念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才在人类学的词汇中获得重要的位置。“他者”的概念作为人类学的主要关怀被广泛接受，导致过去二十年中众多作品深深卷入对那些冠名为“某种主义”的现代思想（进化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如此等等）的批判，这些现代思想曾经代表着西方文明中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思潮的显著特点是总在模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例如“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涉及人文学科中的众多相邻领域，也涉及文学和文化研究。跨学科的两个有趣和突出的特征是：（1）除非谁完全了解内情，否则往往很难指出一个学者归属哪个学科；（2）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间传统的学科界限基本上正在消融。造成后者的原因源于近来关于“相异性”的讨论，换句话说，关于相异的客观化的他者的概念和比较，已经动摇了对人文学科及其所声称的科学权威和客观性的固有信任的基础。

人类学和帝国主义化的他者

根据定义，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直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化的他者（而社会学则研究西方自己内部的阶层）。因此，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经常公开地融合进对客观化的他者的想象，这显然成为许多后殖民批判的对象（Asad 1975；Said 1978；Thomas 1994；de Certeau 1997；Bauman 1995；Fabian 1983）。将相异性概念引入人类学，这本身反映出学科如今对自身历史和其独特的科学客观化进程中的种种不公正之处的清醒认识。它必须面对将他者建构进现代性视野时自己的中心主义（di Leonardo 1998）。由于失去了清白，如今人类学处于一个“自我反思的时代”，在批判后现代的宏大叙事时往往掺合进其他后现代的声音。这项将殖民上升时期的学科活动——标明的举措（无论是否幼稚）是令人痛楚的，特别是提到我们描述他者中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偏离

了自己提出的信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将我们对他的思考去殖民化的进程意味着今天的人类学已与昨日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学由于其历史上对于他者的专门研究，如今却成为揭露殖民遗留的黑暗一面的有力的力量。面对普遍化和全球化，人类学具有可能除了历史学外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力量去理解独特性、地方性的重要意义。人类学保持着对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念和实践体系的敏感，在文化背景中关注特定的生活方式。严谨的人类学家并非总是发布全球化普适主义扫荡的言论。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已受到来自认为人性是普遍的现代性模型的支持者们的攻击（Hollis and Lukes 1982），而另一方面又得到持较为人文观点的人们的赞赏（MacIntyre 1985；Taylor 1985）。自从马凌诺夫斯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著名研究以来，他所提出的要求成为一个主要目标，即理解“土著人”的观念，这基本上提供了所有分析和结论的多维度的框架。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应当掌握如何去理解他者的观点的方法，并避免杜撰一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科学假设轻易吞噬的虚幻的他者。那么事情会在什么地方出错呢？

人类学的诞生和欧洲的学术氛围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那时正是现代主义的高峰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弩之末。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当深入人心，而人类学那时正处于其婴幼儿时期，因此当时的学术、政治氛围必然影响它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人类学详尽的审查自身关于原始他者的言论的原因，并不断地解析自身的主要概念直到揭示出帝国主义、启蒙思想和后启蒙时期的思想对人类学智识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影响。

世纪转折时新的人类学主张拥有自己学术空间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捍卫真理和客观性。它需要生产自己的研究对象（Fabian 1983）。正是马凌诺夫斯基提出的“土著观点”为现代的民族志写作确立了标准、规则和典范。民族志记录的是民族，如同彼得·梅森（Mason 1990：13）命名的那样“是种翻译和演绎的形式”。他接着说（Mason 1990：13）：“所有的民族志，都是对遭遇他者的经历的记录，是一项使他者丧失独特性的举动”。他谈到这种写作受到特定风格和文化传统的限制，必须满足某种期望。在描述特罗布里恩德人时，马凌诺夫斯基的写作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花开的日子》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